

马年说马

在古代,马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帮手,被誉为六畜之首。在《周易·系辞下》中,马被赋予了“负重致远”的神圣使命。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马这一矫健且灵动的生灵,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马被人类驯化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随之快马加鞭。考古资料显示,人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便开始驯化野马。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甘肃省永靖县齐家文化遗址,曾发现随葬的马骨。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墓葬中,则发现了大量的马骨和马车。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更是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和情感。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马”象形的文字:长脸、大眼、鬃毛飞扬、长尾有蹄,与马的形象高度吻合。在后来的语言文字中,与马相关的词汇非常丰富,我们走的路称“马路”,穿的衣服有“马甲”“马褂”,走路快形容为“快马加鞭”“马不停蹄”,犯了错为“马失前蹄”,作出贡献为“汗马功劳”,祝福则有“马到成功”,等等。这些与马有关的词汇,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佐证了马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西周时期,马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更加广泛,而且对马的使用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要求,不同场合使用不同品种的马匹,以及马的装饰用品,都体现着周代的礼制要求。《后汉书·舆服志》载:“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考古发掘出土商周时期关于马的文物,主要是马车、马具、马骨。以马为主题的玉器也开始少量出现,如河南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马(图1),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的黄玉马(图2),陕西秦景公墓出土的黑玉马头等。



由于马在农业、交通、军事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马政。《礼记·月令》里就出现了“马政”一词,即与马有关的行政或政治制度。商代设有专门养马的马小臣,周代则设立了分工明确的马政制度。《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周代的马官有校人、牧师、趣马、巫马、圉人、圉师等,分别负责管理马匹的饲养饮食、医疾、祭祀等事务。如陕西眉县出土的盩厔尊铭文记载了周王举行执驹典礼,升新驹入王室马廄的过程。出土的秦封泥中也有“御廄丞印”“官廄丞印”“都廄丞印”“左廄丞印”“右廄丞印”“上马马丞”“都廄”“左廄”“右廄”等;秦印当中有“左廄将马”“右廄将马”等。

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发愤图强,下令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掀起“胡服骑射”的热潮,改变了当时赵国的军制和民众的日常服饰习惯,赵国的国力从此逐渐强大起来,不但打败了过去经常侵扰的中山国等,而且还向北方开辟了疆域,成为当时争霸中原的“七雄”之一。此后,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正式在中原各诸侯国间盛行,马的繁殖与培育逐渐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秦楚等大国形成了“持戟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兵力结构,出现了“千乘之家”“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从考古发掘来看,周秦时代的高等级墓葬一般都有陪葬的车马坑。如洛阳东周王城发现的“天子驾六”车马坑,秦始皇陵则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兵马俑陪葬坑,并发掘有制作精美的铜车马。汉代时出现了专用的明器,即用小型的陶制马俑代替真马陪葬,唐代则出现了制作精美的三彩马俑(图3),成为陪葬文物中的代表之作。

祭祀马

古人认为人死后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因此,在逝者入葬时,会将生前所用之物随葬地下,以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车马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自然也被纳入随葬的范畴。但马属于珍贵资源,在商朝的祭祀中动辄用牛成百上千,而用马作祭品的现象却较为少见。西周时,物质文明得到较好的发展,马的资源较为丰富,贵族的墓葬中出现了陪葬的车马坑。如河南洛阳的东周王城遗址中,发现多座古墓和车马坑,马坑,其中5号车马坑残留马骨达70具。商周时期,用真车真马陪葬,是一种礼制,对于不同的级别,殉葬车马的数量有着严格规定。春秋战国时期,车马殉葬制度开始走向衰落,出现了真车真马陪葬向陶、铜等器物车马过渡的现象,即便殉葬的马匹也是体质较弱的驽马。如陕西凤翔血池遗址祭祀坑中的马骨(图4),通过DNA测定发现,这些殉葬马大多年龄在一岁到一岁半之间,与《史记》中郑雍祭祀用“驹”的记载完全吻合。

玉石马

玉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装饰陈设、宗教祭祀以及殓葬辟邪等。玉石本是没有生命的矿物,但在中国古代,由玉石制成的各种玉器则被赋予了无限的灵性,成了一种超自然的物品,不仅是身份等级的标志和“究天人之际”的通神礼器,还是趋吉避疫的吉祥之物,是儒家思想“德”的象征。从考古发现来看,早期的玉马雕刻以片雕为主,着重表现马的形态特征,大多只体现马首、四肢以及马尾等关键部位。如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马,造型呈扁平



图4 血池遗址马骨



图8 昭陵六骏(部分)



图9 韩幹《牧马图》



图10 赵孟頫《浴马图》



图5 仙人乘天马

状,具有商代“臣”字眼的典型特征。西周时期,玉马的造型注重写实性,逐渐演变为圆雕造型。如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黄玉马,采用圆雕的手法雕刻,侧面则用双阴线“一面坡”的雕刻技法。汉代以后,玉马造型则更为生动灵活,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玉雕技艺水平,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龙马精神”的崇尚与追求。如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仙人乘天马(图5),集合了羽人、天马、玉石等元素,展现出一种天马羽人在仙境中凌云遨游的神态。

青铜马

商周和秦汉之际,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是出土文物中的代表。商周时期虽然是青铜器的鼎盛之时,但出土的青铜马却不多,马的造型最具代表应是陕西眉县出土的盩厔尊(图6),全器以写实的手法雕塑出一头雄性小马驹形象,整器精准再现了小马驹的全身比例和身体结构,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秦汉时代,尽管青铜器已经走向衰落,但出土的青铜马却较多。如秦始皇帝陵陪葬坑出土的铜车马,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体积最大、结构最

复杂、礼制最高、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西汉阳信公主墓附近出土的鎏金铜马,为仿照西汉时期大宛国所产的“汗血宝马”精制而成,为汉代相马术的实体标准器;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一次就出土37件青铜马,成仪仗队组合排列,其中的铜奔马,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把奔马和飞鸟绝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古代青铜马中的精品之作。

陶俑马

陶俑在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开始将泥捏的人体、动物等放入炉中与陶器一起烧制。秦汉以后,随着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逐渐替代了殉人、殉马,逐渐成为陪葬器物的主流。秦代陶马以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最具代表性,其大小和真马相似,处于明器替代实物的初期。汉代以彩陶马为代表,陶马已经明器化,体型较小,具有象征性。如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的西汉彩绘陶马,体型与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相比已大为缩小。唐代的墓葬中出现了著名的三彩马,这种以黄、褐、绿三色为主的釉陶器,虽然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但却成为陶器发展的顶峰之作。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三彩三花马(图7),器物大小与汉代彩陶马相似,但制作精美,造型逼真,为唐三彩马的代表器型。

石雕马

石雕是古老的民间艺术。从古至今,雕刻艺人以石为材,镌刻历史,传递文明。马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一直是石雕作品的主题之一。如果说玉石适合随身把玩,石刻雕像则适合室外陈列,长期保存。早在秦汉时期,贵族墓葬前就出现了动物石刻、石俑等,如汉代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采用圆雕、浮雕及线刻手法,通过对战马和匈奴的生动刻画,体现了霍去病征服匈奴的英雄业绩。此后的历代王朝,均保持了墓葬前摆放石雕的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以马为主题的石刻雕像,既见证了历史,也传承了文化。如唐昭陵六骏石刻(图8),以李世民乘过的六匹战马为原型制作,姿态神情各异,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唐代西域马的形态,开唐代骏马雕塑的时代新风。

绘画马

在中国绘画史上,以马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较多,马一直是装饰、审美、意象的重要表达对象。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阴山、阿尔泰山等地就出现了早期的岩画,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则出现了马的形象和纹饰。秦汉时期,墓葬中出现以马为题材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隋唐以来,画马成为绘画流行的时尚,擅长画马的画家不仅有职业画工、宫廷画家,还有文人画家,涌现出大量绘画马的作品。如唐代韩幹《牧马图》(图9),运用了“铁线描”绘画技法,以纤细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马匹的轮廓,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马的健壮体型;宋代李公麟《五马图》,用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朝廷的骏马,成为后世画鞍马的范本;元代赵孟頫《浴马图》(图10),马体精确细腻柔美,神情姿态舒展自如,为古代文人画意与宫廷工笔的典范之作。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图6 盩厔尊



图7 唐三彩三花马

侨批是近代华侨与家乡亲人情感联结的重要载体,也被誉为“跨越山海的家书”。早期出洋的华侨,在异国他乡辛勤打拼,通常将积攒的血汗钱寄回国内并附上一封家书,告知自己的近况,问候亲人的安康。侨胞们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给家乡亲属的汇款暨家书即为“侨批”,又称“银信”。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承载着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这个象征团圆的节日,更让漂泊在外的游子倍加思亲。当归乡无望时,侨批便成为他们传递思念、寄托祝福的重要载体。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春节侨批,大多写于正月前后,既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担忧问询,也有和平年代的祝福期盼,字里行间满是海外侨胞对团圆的渴望、对亲人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见证着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在跨地域传播中的传承与延续。

战乱年代的守望与惦念

抗日战争时期,山河破碎,家国飘摇。对于漂泊海外的侨胞而言,春节团圆的期许被战争的阴霾笼罩,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与担忧愈发浓烈。1938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七日),泰国华侨谭炳金寄给广东台山妻子欧氏的侨批,便反映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侨胞对家乡亲人的焦灼与牵挂(图1)。彼时,春节的喜庆氛围尚未消散,谭炳金却在泰国辛辛苦苦打拼,无法与家人团聚。这封他给妻子的信,选用的是带有节日喜庆元素的粉色信纸,但信件中却没有过多的节日欢愉表述,反而满是对家乡局势的担忧。“观中日战争,四邑乡村如何情形一二,顺以告知”,信中简短的一句话,道尽了侨胞对战火中的家乡亲人的深切惦念。在战争的背景下,家乡的安稳与否、亲人的平安与否,成为他们心中最大的牵挂。侨批成为他与家乡保持联系的唯一桥梁,也成为他安放思念的物质载体。

1940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一日),余景舜从广东台山寄给在美国谋生的父亲余积中的航空信,是余景舜写给父亲的回批(图2)。信中余景舜告知父亲,已收到他从美国寄来的春节汇款,不仅按嘱咐分发给家中各人,还按“以度岁买饷之需”的要求购买了过年用的食品。这封信恰逢春节期间,他特意选用带有节日喜庆元素的红色航空信纸,红色作为春节的标志色,象征着吉祥、喜庆。选用红色信纸,既是对传统春节习俗的遵循,也是希望通过这份喜庆与远在海外外的父亲“同度”春节。信件开头便是拜年祈福的美好祝词:“值岁序更新之际,正经营发达之时辰,维首祈迎禄、福躬康泰、财源与韶华并茂为颂”。然而,信中的内容却充满了现实的沉重——战争导致华侨汇款回国的通道不通畅,甚至一度被迫中断,而国内至港澳的航线也被迫封锁。一边是春节的喜悦祝福,一边是战乱带来的困境诉说,将跨国家庭在乱世中的无奈与坚守表现得淋漓尽致。余积中提前汇款给家人以应过春节之需,余景舜及时回信告知家乡及个人情况,这份跨越山海的双向牵挂,成为战乱年代侨乡跨国家庭守望相助的精神支撑。红色信纸、拜年祝词等元素,也展现出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在困境中的延续,成为侨胞情感的寄托。

和平年代的期许与眷恋

抗战胜利后,侨批中的氛围也逐渐变得轻松愉悦,承载着春节的喜悦祝福和对亲人的温情关怀。博物馆馆藏的一封从北婆罗洲文莱寄给广东新会父母的侨批便是如此,信中没有沉重的现实困境诉说,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新春问候(图3)。侨胞在信中向父母致以新春的祝福,同时详细告知自己在文莱的生活情况以及通讯地址等。对于漂泊海外的侨胞而言,春节是思念亲人最浓烈的时刻,向父母送上新春问候,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践行,也是对家庭情感的维系。信中告知自己的生活情况和通讯地址,是希望让父母放心,同时也方便与家人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这封侨批虽内容简洁,却饱含着侨胞对父母的思念与牵挂,展现了和平年代里侨胞与家乡亲人之间温情的情感联结。

1954年2月8日,正值农历正月初六,在香港当佣工的容有情寄给广东新会弟弟的侨批,选用粉色信笺纸,抬头有“恭贺新禧”红色大字及花朵图案;信封也是粉色的,左下角有一童子抱鲤鱼的图案,寓意“年年有余”(图4)。信中写下了很多节日祝福:“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春禧又临人间矣。恭维新禧集庆,福寿康宁,身壮力健,精神焕发,暨家中老少各人均安,至以为颂。”1956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八),容有情又从香港给新会的父母寄了春节侨批,同样选用以粉色和红色为主色调的信纸和信封(图5)。信封正面左上角从右至左有“恭贺新禧”四个大字,左下角有一艘帆船的图案,寓意“一帆风顺”。粉色与红色都是春节的喜庆色彩,“恭贺新禧”是经典的春节祝福话语,而童子抱鲤、帆船等图案,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具吉祥寓意的符号。“年年有余”寄托着对生活富足的期许,“一帆风顺”则承载着对亲人平安顺遂的祝福。这些细节尽显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也让侨批成为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特殊历史节点的家国情怀

侨批不仅承载着侨胞对亲人的情感,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蕴含着侨胞深厚的家国情怀。1974年1月1日,刘德富从泰国寄给广东揭阳兄嫂的侨批,提及中泰两国的关系正走向亲近,预测有望建交,直接来往(图6)。而这一预测在1975年7月1日成为现实——中国与泰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刘德富在春节前后寄给兄嫂的这封侨批,没有局限于个人与家庭的情感表达,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刘德富在信中表达对中泰建交的期待,既是对个人与家庭未来的期许,也蕴含着对祖国发展的关注。这份家国情怀,让侨批的内涵更加丰富,也让中华传统节日文化

纸短情长:春节侨批中的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

罗佩玲



图1 泰国华侨谭炳金寄给广东台山妻子欧氏的侨批



图2 余景舜从广东寄给在美国谋生的父亲余积中的航空信



图3 一封从北婆罗洲文莱寄给广东新会父母的侨批

中“家国一体”的理念得到了生动诠释。春节不仅是家庭团圆的节日,也是侨胞抒发家国情怀的重要时刻,他们将是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复兴的期盼,融入对亲人的祝福之中,让侨批成为连接个人、家庭与国家的情感纽带。

中华传统节日的跨地域延续

春节侨批,虽历经岁月沧桑,纸页泛黄,但其中蕴含的情感与文化力量却历久弥新。它们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侨胞的生活境遇与情感变迁,展现了侨胞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思念与牵挂,更见证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在跨地域传播中的传承与发展。

从节日习俗的传承来看,侨胞在春节期间寄发侨批,本身就是对“岁首送福”“阖家团圆”等传统节日理念的践行。他们虽然身处海外,却始终坚守着春节的传统习俗,通过寄发侨批的方式,向亲人传递节日的祝福,维系家庭的情感联结。从文化符号的运用来看,红色信纸的选用,“恭贺新禧”的字样,童子抱鲤、帆船等吉祥图案的使用,都是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经典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承载着侨胞对吉祥如意、平安富足的期许,也让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核心内涵在海外得到了延续与传播。

此外,侨批中的文化传承还体现在代际传递上。从余景舜与父亲之间的侨批往来,到容有情与弟弟、双亲之间的书信沟通,再到刘德富与兄嫂之间的情感交流,春节侨批成为侨胞家庭传递情感、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年轻一代在与长辈的侨批往来中,不断强化对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认同与理解,将“孝道”“团圆”“家国情怀”等价值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种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让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根脉得以延续,也让侨胞群体始终与祖国、与家乡保持着深厚的情感和文化联结。

虽然侨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所承载的情感与文化价值却永远值得我们珍视。这些春节侨批,不仅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的精神纽带,更是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见证,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多远,中华儿女对家乡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同始终不变。这份跨越山海的情感与文化传承,将永远激励着海内外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图4 在香港当佣工的容有情寄给广东新会弟弟的侨批



图5 容有情从香港给新会的父母寄春节侨批



图6 刘德富从泰国寄给广东揭阳兄嫂的侨批